

同調異聲——以命輯《滿洲源流考》 上諭的三個滿文譯本為例

蔡名哲

乾隆四十二年，皇帝下令編纂《滿洲源流考》。這道上諭出現多個滿漢文本，相較於漢文本的高度一致，此上諭在滿文《實錄》、滿文《起居注冊》與滿文本《滿洲源流考》的內容卻不盡相同。《滿洲源流考》與《起居注冊》滿文譯文的語句順序及用字均不一致；滿文《實錄》雖與《起居注冊》的語句順序較為一致，但用字仍不同，且其斷句更貼合漢文本《實錄》。這顯示當初纂修滿文《實錄》時，並不照錄滿文《起居注冊》，同時未參考已經成書的滿文本《滿洲源流考》。原因應是滿文本《起居注冊》修纂倉促，《實錄》遂在其基礎上加以修改。滿文是二手文獻，譯者追求貼合漢文本的語意，而不追求滿文文本之間的文字相沿，顯示在文書制度中對傳達文義的要求高於文字的照錄，也因此保留了翻譯者對同一漢文文獻的不同理解，呈現「同調異聲」之態。

關鍵詞：滿文翻譯、《實錄》、《滿洲源流考》、《起居注冊》、史料性質

收件：2022年7月13日

修改：2023年6月6日、2023年7月12日、2023年8月17日

接受：2023年11月30日

蔡名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學者，E-mail: saqdaigisun@gmail.com。

本文係「語言、知識、族群與政治——以《御製清文鑑》與《御製增訂清文鑑》為中心的研究」部分成果，期間獲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112-2423-H-001-005-MY2）補助，寫作期間承蒙業師趙令志教授多方指點，初稿曾發表於「歷史的聲音：首都高校研究生論文研討會」（北京，2019年3月），會議上感謝諸多學友惠予寶貴意見，投稿期間獲得匿名審稿人諸多指正，投稿通過後，承蒙《編譯論叢》編輯部多方協助，並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張佑豪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博士候選人吳曼竹分別協助本文漢、滿文文獻的校對，於此致上萬分謝意。

The Variations in the Same Theme: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ree Manchu Translations of the Edict About *Researches of Manchu Origins*

Ming-Che Tsai

In 1777, Emperor Qianlong issued an edict to compile the *Researches of Manchu Origins*. This edict existed in multiple Chinese and Manchu versions. The Chinese versions were mostly consistent. However, the Manchu versions of this edict as recorded in *Veritable Records*, *Imperial diaries*, and *Researches of Manchu Origins* differed from each other. There is a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Manchu translation of *Researches of Manchu Origins* and the Manchu translation of *Imperial Diaries* in terms of wording and sentence sequencing. By comparison, the Manchu translation of *Veritable Records* and the Manchu translation of *Imperial Diaries* share largely similar sentence sequencing but not the wording (or the choices of words), and their word grouping and punctuating are more coherent to the Chinese version of *Veritable Record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compilation of the Manchu *Veritable Records* at the time did not entirely duplicate the Manchu *Imperial Diaries* and did not reference the Manchu *Researches of Manchu Origins* that had previously been completed. The reasons could be that the Manchu *Imperial Diaries* was hastily compiled and the Manchu *Veritable Records* was a result of a moderately modified version of the Manchu *Imperial Diaries*. The Manchu translations of the aforementioned texts are a secondary source and the translators place more focus on faithfully conveying the meanings of the Chinese texts than on checking on the semant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to follow a consistent choice of words between different versions of Manchu translations. This goes to show that in the narr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ystem (of the Qing dynasty), there was a higher demand for conveying the semantics and meanings than duplicating the words, which would therefore result in a case of “variations in the same theme” when translators hold discrepant views on the same Chinese text.

Keywords: Manchu translation, *Veritable Records*, *Researches on Manchu Origins*, *Imperial Diaries*, nature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Received: July 13, 2022

Revised: June 6, 2023, July 12, 2023, August 17, 2023

Accepted: November 30, 2023

壹、前言

滿文材料是清史研究的重要資料，其文本種類繁多，然而各種文本間的關係究竟為何？以漢文上諭為例，本身有漢文之《上諭檔》、《實錄》與《起居注冊》，以及傳抄至各地的抄本，同時亦有滿文本的《實錄》與《起居注冊》。陳捷先（1983）的研究指出：「大抵言之，除部分雍正朝以後的軍機事務外，實錄都取材於起居注冊，而內容則遠不如起居注冊詳盡」（頁2—3）。馮爾康（2006）亦贊同此說。莊吉發（1980）亦指出乾隆朝以後，《起居注冊》先修漢文本再譯成滿文本，而《起居注冊》所載的諭旨均可見於《實錄》。而在滿文檔案與漢文《實錄》的關係中，趙令志與郭美蘭（2015）指出其編纂方針應是滿文本將滿文材料節略，漢文本利用所譯漢文稍加詞藻，但不許偏離原意，而經比對也發現《實錄》修纂並未歪曲原意。學者們逐步釐清了檔案與各種官書的關係，但似乎未提乾隆朝後若上諭原文是漢文，相關的滿文本會如何呈現？滿文本《實錄》與其他滿文材料也有彼此沿襲取材的關係嗎？抑或是各自譯滿，在滿文《起居注冊》與《實錄》的相關研究上，可知乾隆朝開始漢文本為先，但上述問題並未見解答（陳捷先，1978，1973 / 2018），¹此即為本文所欲解答的問題。²

本文選擇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八月十九日命纂《欽定滿洲源流考》（hesei toktobuha manjusai da sekiyen-i kimcin）之上諭，³因其滿文本除有滿文

¹ 目前相關比較似只有莊吉發（2013）的研究，但其文比對之材料為康熙朝《起居注冊》與《實錄》，未涉及乾隆朝。

² 為求行文簡便，本文涉及文獻比對的段落，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出版之《乾隆朝上諭檔》簡稱一檔館藏《上諭檔》；《乾隆四十二年長本上諭檔》簡稱為《上諭檔》；《為本朝肇興東土仍係大金部族事》簡稱內閣大庫藏件；《奉上諭項閱金史世紀我朝肇興舊稱滿珠相沿訛為滿洲他如沿革滿洲始基古今地名同異稽考勒為一書著大學士阿桂等悉心檢核分條編輯以次呈覽由》簡稱盛京內務府藏件；《起居注冊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下草本》簡稱《起居注冊》草本；《起居注冊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下正本》簡稱《起居注冊》正本；《滿文起居注冊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下》簡稱滿文《起居注冊》；《滿文本欽定滿洲源流考》簡稱滿文《源流考》；《欽定滿洲源流考》簡稱《源流考》；《滿文本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簡稱滿文《實錄》；《清高宗實錄》簡稱漢文《實錄》。

³ 本文之滿文轉寫大體使用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轉寫法，只有二處略有不同。首先左邊有一點點的n，穆麟德轉寫法未提供相關符號，本文模仿其形制轉寫為“n”；穆麟德轉寫法將單點停頓符號轉為“，”，雙點為“，，”，但容易讓人將其等同於逗號與問號，本文模仿其形制分別轉寫為“，”與“，，”。

《起居注冊》與滿文《實錄》版本外，另也收錄於滿文本《源流考》。滿文本《源流考》約成書於嘉慶四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2000），其修纂官中的董誥同時也是《實錄》修纂負責人之一，因此成書於嘉慶十二年（1807年）的《高宗純皇帝實錄》，應該有條件知道當時有滿文本《源流考》這本書。滿文本之外，本文同時取《源流考》（阿桂、于敏中，1967）、《實錄》（慶桂等，1986）、一檔館與臺北故宮《上諭檔》（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91；佚名，1777c）、臺北故宮《起居注冊》草本與正本（佚名，1778a，1778b）、中研院史語所藏內閣大庫藏件、遼寧省檔案館藏盛京內務府藏件（佚名，1777a）的各種漢文本上諭版本加以比對，希望能解答上述問題。

貳、文本比對

上述收錄本道上諭的各文獻，由於格式的不同，其前後文會有些許字樣的不同，比如《源流考》與《起居注冊》都會書明奉上諭的日期，而《實錄》則是在上諭之外，前後寫明事情的始末，比如上諭前寫「命輯滿洲源流考，諭」（慶桂等，1986，頁918），滿文為“hesei manju-i da sekiyen-i kimcin-be acabume banjibukini seme afabure jalin hese wasimbuhanngge”（慶桂等，1807，頁6a），其中便可以見滿文《實錄》所書之《源流考》滿文書名與滿文《源流考》上所書並不同，滿文《源流考》的滿洲使用複數的所有格形式“manjusai”，便可以說明本書所討論的是滿洲人的源流，本身較漢文更能清楚表達其意，⁴而不會有後世滿洲是否是地名的疑問（傅斯年，2012）。而盛京內務府藏件雖是本道上諭的漢文抄本，但封套上用滿文寫明文書之事由，亦用“manjusai”一字，可見盛京地方官員也理解此道上諭之滿洲為滿洲人。

經過比較，漢文諸版本的內容高度相同，大體上是增缺字或是異體字的

⁴ 《四庫全書》、《清史稿》將《滿洲源流考》列入「史部」的「地理類」，學者認為掩蓋了其做為民族史論著的特徵。此外，論者認為時人將滿洲當作地名，最後合理化中國東北的分離主義，促成「滿洲國」政權的出現，因而強調滿洲是族名而非地名（孫文良，1987，頁49、51；鄭天挺，2011，頁3）。所謂民族與民族史論著是當代的概念，但從滿文來看確實本書討論的是滿洲人群的源流。

差異。但有三處涉及文義的差異，⁵前兩處是「三國必有三汗」、「史家不知汗為君長之稱」（佚名，1777c，頁 84a）二句中的「汗」，內閣大庫藏件、盛京內務府藏件均寫「漢」（佚名，1777a，原咨黏單，1777b，頁 5），《起居注冊》的草本原寫為「漢」，後塗改為「汗」（佚名，1778b）。此處「漢」、「汗」之異，應是上諭自軍機處發往內閣時傳抄錯誤，又或是內閣以為「汗」字用於三韓不妥而作修改，兩份移會均由內閣發出而沿襲此寫法。起居注官員應是依據內閣絲綸簿修纂草本，後核對其他檔案再予更改。第三處是《上諭檔》寫「《後漢書·三韓傳》為辰韓人兒生欲令頭匾」（佚名，1777c，頁 84a），但一檔館藏《上諭檔》、內閣大庫藏件、盛京內務府藏件、臺北故宮藏兩種《起居注冊》與《實錄》改為「《後漢書·三韓傳》謂辰韓人兒生欲令頭扁」（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91，頁 742；佚名，1777a，原咨黏單，1777b，頁 5，1778a，十九日壬子，段 3，1778b，十九日壬子，段 3；慶桂等，1986，頁 918）。《實錄》等書改動的漢文較為正確。這一處差異也可與滿文譯文的差異對照，下文將說明之。

相對於漢文本的高度雷同，滿文本的差異卻較大。據本文估算，漢文本若將所有歧異都計算進去，《上諭檔》與其他文本的歧異度約為 0.96%，但滿文《源流考》與滿文《起居注冊》的歧異度約為 19.34%，與滿文《實錄》的歧異度約為 20.92%，滿文《起居注冊》與滿文《實錄》的歧異度約為 8.13%。⁶滿文譯文這些差異大致可分為「錯譯／誤譯」、「有歧義的翻譯」、「翻譯者不同的文句斟酌」幾種狀況，以下分析滿文本的差異。

⁵ 漢文本有 11 處文字上的差異，但除正文提及的「漢」與「汗」、「謂」與「為」、「金世祖」與「金始祖」較涉及文義的差異外，大致上屬於增缺字或異體字的差異。這些差異為「後改滿珠」與「後改稱滿珠」、「甚矣其妄」與「甚矣其妄也」、「無庸深較」與「毋庸深較」、「松山」與「崧山」、「為之報仇」與「為之報讎」、「統一寰宇」與「統壹寰宇」、「布勒瑚里池」與「布勒瑚里」。與下文的滿文本差異相較，可見漢文本的差異幅度小於滿文本。

⁶ 本文計算歧異度的方法，為利用 word 軟體的「比對」功能得出修正筆數，該功能會將一字的差異理解為增與刪兩筆修訂，因此取修訂筆數的二分之一除以做為母文本之總字數，藉此計算文本的歧異程度。word 是以單字數而非字元數計算滿文字數，譯文之字數約為漢文的 0.91 倍，若將此翻譯產生的比率考慮進去，將滿文文本的差異度乘以 0.91，其差異度亦高於漢文文本之間的程度。word 若遇到連續的修改，僅會視為兩筆修訂，因此若以單字甚至字元的更動計算滿文文本之間的歧異度，將會得出更高的數值。

一、錯譯／誤譯

「錯譯／誤譯」是指在漢文本之文義相對明確的狀況下，有些版本的滿文譯文卻理解錯誤而產生的翻譯，或者是漢文本本身文字不同，導致滿文譯文因誤解而誤譯的狀況。前者比如漢文「他如建州之沿革，滿洲之始基」（佚名，1777c，頁 85b）一語，滿文《源流考》譯為“jai giyan jeo-i halaha songkoloho. manjusai da sekiyen”（阿桂等，1799，頁 9b）（及建州之沿革，滿洲人之源流），但滿文《起居注冊》卻翻譯為“tereci gūwa ilibuha jeo-i dahara halara manju-i da sekiyen”（佚名，1778c，頁 27b）（此外如建立州之沿革，滿洲之源流），滿文《實錄》譯為“jai hecen ilibure-de songkoloho halaha. manju-i deribuhe sekiyen.”（慶桂等，1807，頁 10b）（及建城時之沿革，滿洲開始之源）。其中「建州」一詞便涉及錯譯，滿文《源流考》直接音譯為“giyan jeo”，但滿文《起居注冊》卻翻譯為“ilibuha jeo”（建立的州），不知道其是要意譯建州，還是以為是滿洲初興之時所立的各州，但從滿文《起居注冊》翻譯「列公」、「三韓」都採取音譯為“liyei gung”、“san han”的模式來看，翻譯者應是不知道建州是滿洲初興時的集團名稱，而滿文《實錄》更直接將建州理解為“hecen ilibure”（建城），其採用動賓片語，代表翻譯者直接將建州當做建城的行動，完全不知道建州為專有名詞。

有些則是因漢本文字不同產生的錯譯。這種情形在上諭一開頭便可見，「金世祖居完顏部」一語中的「金世祖」，若翻查《金史》可知原文應是「始祖」，《源流考》已改為「金始祖」（阿桂、于敏中，1967，頁 3），滿文《源流考》也譯為“deribuhe mafa”（阿桂等，1799，頁 1a）（始祖），滿文《起居注冊》則理解為金朝的開國人群而譯為“aisin gurun”（佚名，1778c，頁 20a）（金朝），滿文《實錄》翻譯為“ši dzu han”（慶桂等，1807，頁 6a）（世祖汗），譯文接近漢文的《上諭檔》，理解為「金世祖」一人，雖然此發音亦符合「始祖」的音，但若配合漢文看應是將《金史》故事的主角誤解了。

《上諭檔》的「《後漢書·三韓傳》為辰韓人兒生欲令頭匾，押之以石」（佚名，1777c，頁 84a），一些漢文本則寫「為」為「謂」，意思較為正確。

滿文《源流考》譯為“geli amangga ha.n gurun-i bithe-i ilan ha.n gurun-i ulabun-de cen ha.n gurun-i niyalma. juse banjifi uju-be halfiyan okini seme wehe-i gidambi sehebi.”（阿桂等，1799，頁 2a-b）（又《後漢書·三韓傳》云辰韓之人，孩子生了之後，希望頭扁而以石頭壓之），滿文《實錄》的譯文亦差不多，但滿文《起居注冊》卻譯為“geli amangga ha.n gurun-i bithei san ha.n sere ulabun-de. cen ha.n seme narahabi[arahabi]. tubai niyalma jui banjifi uju-be halfiyan okini seme wehe-i gidambi sehebi.”（佚名，1778c，頁 21a）（又《後漢書》的叫做三韓的傳中寫做辰韓。云：那邊的人孩子生了之後，希望頭扁而以石頭壓之），與《上諭檔》原「謂」寫「為」的錯誤類似，不知是否受漢文影響？倘若如此，滿文《起居注冊》的修訂與上諭檔的關係亦值得推敲。

另外也有因為漢文斷句不同而產生的不同翻譯。「我朝肇興時，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佚名，1777c，頁 83b）一句，滿文《源流考》為“musei gurun deribume mukdehe fonde daci manju-i harangga niyalma-be jušen sembihe.”（阿桂等，1799，頁 1b）（我朝開始興盛之時，原稱滿洲屬人為珠申），滿文《起居注冊》與之類似，譯為“musei gurun fukjin mukdere-de. daci manju-i hartungga-be jušen sembi”（佚名，1778c，頁 20b），惟時態上滿文《源流考》使用 -mbihe 更為貼合語境，表示是過去的習慣（河內良弘、清瀨義三郎則府，2002）。滿文《實錄》則譯為“musei gurun fukjin mukdere-de. daci manju sembi. harangga urse-be jušen sembihe”（慶桂等，1807，頁 6b）（我朝發祥時，原稱滿洲，屬人稱珠申）。滿文《實錄》譯文與其他兩版本的差異，正好與《實錄》斷句為「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相同（慶桂等，1986）。陳捷先（2007）依據《實錄》的斷句，認為乾隆皇帝於《源流考》中對「滿洲」的解釋模稜兩可，一方面說是肅慎的轉音，一方面又聯繫到藏傳佛教。其實若依據滿文《源流考》與滿文《起居注冊》，可知此處所討論的是身為「滿珠所屬」的「珠申」是肅慎的轉音，主語是珠申，不包含滿珠，《實錄》版本的斷句誤導陳捷先以為此處同時討論滿珠與珠申。

二、有歧義的翻譯

「有歧義的翻譯」是指其譯文不到錯譯的層次，但是若細讀某些版本之滿文譯文，會發現其不符合漢文的語境，或者是無法貼合漢文語境，產生歧義的翻譯。如乾隆帝認為當時三韓各有其汗，「各統其一」一語（佚名，1777c，頁 84a），滿文《源流考》用“meimeni emte gurun-be kadalajahi”（阿桂等，1799，頁 2b）（各統領一國），但滿文《起居注冊》與滿文《實錄》則譯為“meimeni emu babe uherilehebi.”（佚名，1778c，頁 22a；慶桂等，1807，頁 7b）（各統一一地），將漢文的「統」理解為「統一」，不符合原文語境。「明季」（佚名，1777c，頁 84b）中文意思應為明朝末年，滿文《源流考》作“ming gurun-i dubesilehe fon”（阿桂等，1799，頁 4a）（明朝末年），但滿文《起居注冊》與滿文《實錄》均寫為“ming gurun-i fonde”（佚名，1778c，頁 22b；慶桂等，1807，頁 7b）（在明朝），並未捕捉到「明季」的確切意涵。

又如「尊崇本朝者」（佚名，1777c，頁 84b）一句，滿文《源流考》與滿文《起居注冊》均書為“musei gurun-be wesihuleme tukiyere urse”（佚名，1778c，頁 23a；阿桂等，1799，頁 4b），但滿文《實錄》卻寫為“musei gurun-i wesihuleme tukiyere urse”（慶桂等，1807，頁 8a）（本朝所尊奉者），雖能以所有格翻譯為「本朝的尊奉者」，但讀者亦可能以主格屬格理解（河內良弘、清瀨義三郎則府，2002），而譯為「本朝所尊奉者」。滿文《實錄》以所有格翻譯會產生歧義，不如以前二者以賓格“-be”翻譯來得貼合漢文。

「譬之漢唐宋明之相代。豈皆非其勝朝之臣僕乎」（佚名，1777c，頁 84b）中的「相代」與「勝朝」，滿文《源流考》分別作“ishunde halanjahangge”（相互更替）與“etehe gurun”（勝利之國）（阿桂等，1799，頁 5b），看似按照漢文原文字面意思翻譯，但「勝國」二字據學者研究，原先是「亡國」，本身使用涉及先秦時期的政治思想，涉及了征伐之意涵，字面上看不必然是先朝之意，但在明清之時華夏之辨的語境中使用，意思漸明

確為已亡的先朝，使用該字能避免華夏之辨中的歧視字眼，也能確立朝代的承傳（洪麗珠，2018）。但是滿文的“etehe gurun”反而是「勝利之國」的意思，若將“etehe”（勝利）改用被動態翻譯似乎較好。滿文《起居注冊》與滿文《實錄》則寫為“ulanduhangge”（相互傳遞）與“nenehe jalan”（前代）（佚名，1778c，頁 24a；慶桂等，1807，頁 8b），除了將「勝朝」為先朝的意思表述出來，也將朝代之間相互競爭，滅亡前朝的意象轉變為連續性的承傳。

「可為金源同派之證」（佚名，1777c，頁 84b）一語，滿文《源流考》為“erebe aisin gurun-i emu sekiyen ojoro temgetu obuci ombi.”（阿桂等，1799，頁 5a）（此可為與金朝一源之證），滿文《起居注冊》為“erebe aisin gurun-de daci emu fisen ojoro temgetu obuci ombi.”（佚名，1778c，頁 23b）（此可為在金朝時原是一系之證），滿文《實錄》則為“erebe daci aisin gurun-i emu fisen ojoro temgetu obuci ombi”（慶桂等，1807，頁 8a-b）（此可為與金朝一系之證），“sekiyen”與“fisen”都表明了乾隆皇帝心目中的金朝與愛新覺羅皇室有同一來源的關係，但“fisen”可能是較晚出的滿語詞彙，並非早期滿洲人習慣使用的表達方式，使用“fisen”應較使用“sekiyen”受到漢文字面影響。⁷另外，滿文《起居注冊》的譯文，卻明確表示了時間點在金朝，令人進一步感到三仙女神話發生於金代，這並非乾隆皇帝所表述的或明言的，因此這應是翻譯者自己的理解。

在描述金朝之先的渤海國等已有文字禮樂一段（佚名，1777c，頁 85b），滿文《源流考》在時態上使用過去式“bihe”（阿桂等，1799，頁 9a）（曾有），較為正確，滿文《起居注冊》與滿文《實錄》則使用“bisire”（佚名，1778c，頁 27a；慶桂等，1807，頁 10b）等現在式形態。提及滿文為額

⁷ 康熙朝編纂以滿文釋義滿文的《御製清文鑑》，其中“sekiyen”的釋義為「水源所出的地方」（阿爾泰語研究所，1978，頁 50），“fisen”一詞則未被收錄。康熙年間編纂的《大清全書》另稱“fisen”為「以頸血濺大王之濺」（沈啟亮，2008，頁 361），同為康熙年間編纂的《滿漢同文全書》亦如此釋義（佚名，1690，頁 17a）。乾隆朝的《御製增訂清文鑑》則有“han-i fisen”一詞對應之漢字寫為「帝系」（清高宗，1986，頁 11a-b）。推測“fisen”作為「系」是由「濺」、「噴」之類的概念推演而來，表示兩個事物由同一來源衍生而來，應是較晚出的滿語。“fisen”與“sekiyen”雖都是描述來源的辭彙，但“fisen”似乎較強調衍生，較少強調最初來源的意涵。

爾德尼等人「遵制」時，滿文《起居注冊》僅用“toktobufi”（佚名，1778c，頁 27a）（使定），滿文《實錄》則是“fukjin toktobufi”（慶桂等，1807，頁 10b）（初定／定下基礎），滿文《源流考》則為“songkolome banjibufi”（阿桂等，1799，頁 9a）（遵制），較為清楚，且用“songkolombi”一字表示出額爾德尼等人遵照了努爾哈齊的意旨。「金初之字」一語，滿文《源流考》為“aisin gurun-i tuktan fon-i banjibuha hergen”（阿桂等，1799，頁 9a）（金朝初始之時所造之字），滿文《起居注冊》與滿文《實錄》則為“aisin gurun-i fukjin toktobuha hergen”（佚名，1778c，頁 27b；慶桂等，1807，頁 10b）（金朝初定／定下基礎之字），滿文《源流考》較符合漢文語境，因為這些文字皇帝認為是金初所定，譯文書明時間點，但若是滿文《起居注冊》與滿文《實錄》的譯文，這些「初定」之字也可以是金末方初定，語意並不清楚。乾隆帝這道上諭強調了清朝與金朝的連續性，因此上諭此時討論金朝文字與滿文之關係，應是要解答兩者既然有連續性，為什麼文字不一樣，乃至額爾德尼等人必須創製滿文的問題。滿文《起居注冊》與滿文《實錄》的譯文選用“fukjin”（開端）描述金朝或金朝之前的文字，或許也是這種金朝文字與本朝文字應有連續性思維的反應。

三、翻譯者不同的文句斟酌

「翻譯者不同的文句斟酌」是譯文有所差異，但未涉及文義的理解錯誤，而是不同譯者對同一漢文的斟酌。雖未涉及錯誤，但亦能見到不同譯者面對同一漢文之用心，顯示翻譯並非僅是機械性的對應。有一些是名詞的差異，比如「鞞鞞」（佚名，1777c，頁 83b）一詞，滿文《源流考》、滿文《起居注冊》與滿文《實錄》分別翻譯為“mo ho”（阿桂等，1799，頁 1b）、“mo he”（佚名，1778c，頁 20b）、“me he”（慶桂等，1807，頁 6b），顯示了翻譯者對該詞彙的發音並不一致。此外，乾隆皇帝視為滿洲先祖的族群卻沒有統一的滿文名稱，而滿文的“ho”跟“he”的子音“h”發音部位亦不同，⁸此二

⁸ “ho”的“h”發音為 /χ/，“he”的“h”則為 /x/。/χ/是當時漢文沒有的音，《欽定清漢對音字式》則說“ho”要「重讀」（清高宗，1772，頁 2b）。

點值得研究者注意。

「漢字相沿，訛為滿洲」（佚名，1777c，頁 83b）一語，滿文《起居注冊》與滿文《實錄》譯為“nikan hergen ishunde songkolohoi tašarame. man jeo seme arahabi”（佚名，1778c，頁 20b；慶桂等，1807，頁 6b），用副詞“ishunde”翻譯「相」字，“songkolohoi”（奉行著）表示「奉行」動作的延續，貼合了「相沿」二字，但滿文《源流考》則翻譯為“nikan hergen-i songkolome arahai tašarame man jeo sehe”（阿桂等，1799，頁 1b—2a），則用“arahai”，表示「書寫」動作的延續，亦符合漢文「相沿」的意思，斷句上更接近漢文原文，同時指出乾隆皇帝所指之訛乃是相繼的書寫錯誤所產生。「其實即古肅慎為珠申之轉音」（佚名，1777c，頁 83b—84a）一語的「其實」，滿文《源流考》譯為“yargiyan oci”（阿桂等，1799，頁 2a）（實為），較貼合漢文，而滿文《起居注冊》則為“terei yargiyan-be kimcici”（佚名，1778c，頁 20b）（究其實）則更為生動；滿文《實錄》則翻譯為“terei yargiyan-be kimcici. julgei su šen serengge. uthai jušen shei forgošoho mudan”（慶桂等，1807，頁 6b），其中用“shei”表示珠申為肅慎轉音一點是自古一直持續的，符合皇帝證明滿洲族源淵遠流長的編纂目的，更傳達漢文未能清楚傳達的意境。

「意當時三國必有三汗，各統其一」（佚名，1777c，頁 84a）一句，三份滿文譯文在表示「汗」及「韓」時，均小心符號的使用，若表示「韓」，均在滿文左邊加上一點，作“ha.n”以示不同於君長之號的「汗」，但滿文《實錄》則是在表示此句的「汗」時也作“ha.n”（慶桂等，1807，頁 7b），應是翻譯人認為此處所表示的「汗」，畢竟與指稱皇帝的「汗」不同，因此仍予以加點避諱。同樣涉及「汗」名號理解的還有「桀犬之吠」（佚名，1777c，頁 84b）中的「桀」的譯文，滿文《源流考》與滿文《起居注冊》均書為“giyei han”（佚名，1778c，頁 22b；阿桂等，1799，頁 4a），夏桀雖為暴君，但仍是正統王朝之帝王，但滿文《實錄》則寫為“giyei ha.n”（慶桂等，1807，頁 8a），隱含對其地位的貶斥。「文王西夷之人」（佚名，1777c，頁 84b）一句中文王的譯文亦涉及此問題，滿文《源流考》與滿文《起居注冊》均書為“wen wang”（佚名，1778c，頁 23a；阿桂等，1799，頁 4b），但滿文《實錄》

書為“wen wang han”（慶桂等，1807，頁 8a），綜合前述「三汗」與「桀」的例子，可以看出滿文《實錄》此處清楚稱周文王為汗，表示其正統地位，“wang”本身已是稱號，但滿文《實錄》翻譯者可能認為如此無法突出周文王的正統地位，因此加上“han”字。⁹

「普天率土，統於一尊，理固如斯也」（佚名，1777c，頁 84b）一語，滿文《源流考》譯為“abkai fejergi gubci baingge emu ejen-de uherilebure-be dahame. giyan-de yargiyan-i uttu.”（阿桂等，1799，頁 5b）（天下全境統於一主，故於理真是如此），滿文《起居注冊》卻譯為“abkai fejergi gubci baingge uhei emu-be wesihulerengge giyan uttu kai”（佚名，1778c，頁 24a）（崇奉天下一統，理應如此），滿文《實錄》多同滿文《起居注冊》，惟將「崇尚」一詞改以過去式“wesihulehengge”表達（慶桂等，1807，頁 8b），兩者的意思都較漢文原文多做引申。

「妄信讒言」（佚名，1777c，頁 85a）一語，滿文《源流考》書為“geli acuhiyan gisun-de balai akdafi”（阿桂等，1799，頁 6b）（又妄信讒言），滿文《起居注冊》與滿文《實錄》寫為“geli acuhiyadara gisun-be balai donjifi”（佚名，1778c，頁 25a；慶桂等，1807，頁 9a）（彼又妄聽讒言），「信」與「聽」二者程度不同，滿文《源流考》譯文較佳也貼合漢文。「以七大恨告天」（佚名，1777c，頁 85a）一語，滿文《源流考》為“nadan amba koro baita-be abka-de alafi cooha gaifi kimun gaimе.”（阿桂等，1799，頁 6b）（將七大恨告天，領兵復仇），滿文《起居注冊》作“nadan amba seyecun-be arafi. abka-de

⁹ 清代翻譯工作者對於滿文之譯法，並非隨意譯之，應是都有各自的一套翻譯訣竅，惟僅看字面意義難以理解。古代聖王是否加“han”，能見諸於當時的相關討論。中央民族大學藏有《翻譯批答》一書，時間與作者不詳。本文推測為光緒朝之書，因其中提及要避諱“hūwan”字為“huwan”，應是避光緒帝生父醇親王之諱。該書談論滿文翻譯之理論，其中便提及：「舜、禹、文、武、新法以未有天下之時言之，則不加 han，然細按之，則是連番疊舉，泛而論之之辭，刪去 han 字，以求簡耳。蓋舜禹等字，皆為上賓以後，郊天而祀以證之者也。夫重華協帝曰舜，受禪成功曰禹，以德有天下曰文，以威有天下約武，既舉其證而稱之，曷可不加 han 哉。至武王伐紂，厥時，已自稱王，故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也。』是宜加 han 矣。然不加 han，亦不為錯者」（佚名，1863—1907，頁 8—9）。由此觀之，文本加“han”與不加“han”並非隨意為之，雖然兩種譯法都沒有錯誤，但隱含了譯者的理解與思想在其中。

alame wecefi. kimun gaime cooha deribufi.”（佚名，1778c，頁 25a）（作七大恨告祭天，復仇興兵），滿文《實錄》則為“nadan amba koro-be abka-de alame wecefi. kimun gaime cooha deribufi.”（慶桂等，1807，頁 9a）（將七大恨告祭天，復仇興兵），七大恨的「恨」，滿文《起居注冊》作“seyecun”（怨恨），滿文《源流考》與滿文《實錄》均為“koro”（傷害、怨恨），看似兩者都可，但在《滿文原檔》中，七大恨的原文確實寫為“koro”（馮明珠，2006，頁 79—82）。“koro”本身還有受到傷害、苦痛的意思（阿爾泰語研究所，1978，頁 218），使用“koro”一詞表示了當年清太祖向上天控訴明朝不公對其造成傷害的情境。康熙年間編纂的滿文辭書，則未見到“seyecun”一詞，從詞根可知該詞是從“seyembi”（恨）派生而來。因此滿文《源流考》與滿文《實錄》譯文的用字較符合七大恨告天時的歷史情境，滿文《起居注冊》譯者前述其曾使用“fisen”一詞，此處使用“seyecun”一詞，顯示該名譯者較易受到漢文字面意思影響並使用相對晚出的滿語詞彙。

「明為元之百姓」（佚名，1777c，頁 85a）一語中的「百姓」，滿文《起居注冊》直接翻譯為“tanggū hala”（佚名，1778c，頁 25b）（百姓），直接翻譯自漢文字面，滿文《實錄》則採用意譯，直接翻譯為“irgen”（慶桂等，1807，頁 9b）（民），滿文《源流考》的翻譯則剛好綜合了兩者，為“tanggū halai irgen”（阿桂等，1799，頁 7a）（百姓之民），既翻譯了字面也翻譯了字義。《御製清文鑑》釋義“irgen”為「天下之人」，該書也收有應是來自漢文的“tanggū hala”一詞，表述是因為天下之人姓氏眾多，所以總稱為“tanggū hala”（阿爾泰語研究所，1978，頁 138）。《御製清文鑑》的釋義顯示“tanggū hala”是專門用來統稱“irgen”的姓氏，雖然釋義偏重於「姓氏」的層面，但應已具備指涉“irgen”的作用。滿文《源流考》譯者可能因對“tanggū hala”的釋義偏重於姓氏層面，也可能受到該詞的字面意思「一百個姓」影響，而認為該詞不夠精確（若細思，公侯將相不亦在「百姓」的範圍）遂加上明確指涉的“irgen”。這本身的問題涉及漢語「百姓」一詞所包含的意義，不一定同等轉移到滿文相同字面的詞彙。

上諭評判漢唐宋明取秦隋周元而代之，「或攘或侵，不復顧惜名義」（佚名，1777c，頁 85a），滿文《源流考》翻譯為“*uttu bime.ememungge durime gaihabi. ememungge necinjime sucunjihabi. gebu jurgan-be majige hono hairame tuwašataha ba akū*”（阿桂等，1799，頁 7b）（然而，有些奪取，有的侵犯，無稍惜守名義之處），滿文《起居注冊》作“*embici durire embici necinere-de fuhali gebu jurgan-be gūninahakūbi*”（佚名，1778c，頁 25b）（或奪或侵，此中竟不思及名義），滿文《實錄》譯為“*embici durime gaiha embici gidanafi gaihangge-de fuhali gebu jurgan-be gūninahakūbi*”（慶桂等，1807，頁 9b）（或奪取或欺壓取之，此中竟不思及名義），滿文《源流考》翻譯較貼合漢文強調的「顧惜」意思，滿文《起居注冊》及滿文《實錄》較屬意譯。

「若我朝乃明與國，當闖賊擾亂，滿文明社既移之後，吳三桂迎迓王師入關」（佚名，1777c，頁 85a）一語，滿文《源流考》翻譯“*aika musei gurun oci. ming gurun-i gese sasa gurun. cuwangdzei hūlha burgindume facuhūraha. ming gurun-i doro emgeri guribuhe manggi. u san gui han-i cooha-be okdome gajifi. furdan-de dosifi*”（阿桂等，1799，頁 7b）（若我朝如明一般的並存之國。闖賊動亂，明朝之道已被移，吳三桂迎領汗軍後，入關），滿文《起居注冊》譯為“*musei gurun oci. ming gurun-i adaki gurun. cuwang dzei hūlha ming gurun-be facuhūrame jobobume guribuhe amala. u san gui. wang-ni cooha-be furdan-de okdome dosimbufi.*”（佚名，1778c，頁 25b—26a）（我朝為明朝之鄰國。闖賊擾亂明朝，使其移後，吳三桂將王師迎入關），滿文《實錄》譯為“*musei gurun oci. ming gurun-i adaki gurun. liodzei hūlha facuhūrame jobobume ming gurun-i doro-be guribuhe amala. u san gui. amba cooha-be okdome furdan-de dosifi.*”（慶桂等，1807，頁 9b）（我朝為明朝之鄰國。流賊擾亂，使明朝之業移後，吳三桂迎大軍而入關）。關於「與國」的概念，一般認為是「相互友好之國」，但這似乎不太符合明清兩國之關係，因此滿文的翻譯值得一看，滿文《源流考》譯為「如明一般的並存之國」，強調了清政權的性質與明朝平等，而當時共同存在，滿文《起居注冊》及滿文《實錄》則翻

譯為「鄰國」，但是漢文的與國概念不一定要相鄰，¹⁰ 因此翻譯為鄰國雖符合明清的地理位置，但與漢文語意有差別。而關於「王師」，滿文《起居注冊》譯為「王的軍隊」，雖然與漢文字面完全貼合，但是清世祖當時並不僅是「王」，而是「皇帝」，滿文《實錄》則改為「大軍」，強調大清軍容壯盛而不按照「王」的字面翻譯，而「滿文《源流考》則譯為「汗的軍隊」最為貼切，因為“han”也有皇帝的意思。而「明社」，滿文《源流考》與滿文《實錄》都翻譯為明朝之「統」（doro），¹¹ 滿文《起居注冊》僅翻譯為「明朝」，前二者翻譯似較佳，更清楚指涉明朝統緒（doro）已亡。

「朱果發祥」（佚名，1777c，頁 85b）一語，滿文《源流考》譯為“fulgiyan tubihe-i sabi-de eldekengge”（阿桂等，1799，頁 8a）（因朱果祥瑞降生），滿文《起居注冊》則是“fulgiyan tubihe-i sabi tucinjihengge”（佚名，1778c，頁 26b）（朱果祥瑞出），滿文《實錄》則為“fulgiyan tubihe-ci hūhuri badarakengge”（慶桂等，1807，頁 10a）（從朱果闡福），滿文《實錄》應是以“hūhuri”（福）為「祥」，“badarambi”（張揚）為「發」，應是為了貼合漢文，滿文《源流考》則是清楚表示此語與布庫里雍順之降生有關，滿文《起居注冊》相比之下意思雖沒錯，但在字面與字義似都不如另兩者。「周之高禰履武」（佚名，1777c，頁 85b），滿文《源流考》譯為“jeo gurun-i amba niyalmai songko-be fehuhu”（阿桂等，1799，頁 8a-b）（周朝的踩到巨人腳印），滿文《起居注冊》與滿文《實錄》都翻譯為“jeo gurun-i g’ao mei wecen-de bethei songko-be fehure”（佚名，1778c，頁 26b；慶桂等，1807，頁 10a）（周朝的因高禰神而踩到腳印一事），滿文《源流考》譯文翻譯周朝起源傳說本

¹⁰ 《御製清文鑑》釋義“adaki”為「任何附近緊挨居住的房子」（阿爾泰語研究所，1978，頁 333），可見滿文語境中“adaki”強調了地理空間上的接近。但在漢文史料中使用「與國」一詞時兩國不一定要相近，比如《籌辦夷務始末》提及查拏匪徒恐礙英國船隻通行時，便曾言及「殊非優待使臣、結交與國之意」（賈楨等，1970，頁 5815）。英國與清朝明顯非「相鄰」之國度。

¹¹ “doro”一詞語意甚多，常見的有「道」、「禮」等等意思，亦能指涉一個政權或一個事業。《御製清文鑑》釋義“doro”為“an kemun dorolon kooli”（阿爾泰語研究所，1978，頁 65），大致可譯為「常規禮法」，都是要讓人遵循的規範。可能規範的概念，與政權這種制訂規範使人遵守的力量在意涵上是可以共通的。在此處可以使用政權或事業的概念來理解，本文則選用字典釋義所無的「統」字，因在許多文獻中“doro”與「統」可以對譯，比如筆者所見檔案中「繼承大統」之滿文本寫為“amba doro-be sirame alifi”（李蔭樾，1735，頁 6、10）。

身，但未提及高禔。「垂示天下萬世」（佚名，1777c，頁 85b）一語，滿文《源流考》為“abkai fejergi tumen jalan-de isitala tutabuci acambi.”（阿桂等，1799，頁 9b）（應存留直至天下萬世），滿文《起居注冊》與滿文《實錄》則是“abkai fejergi tumen jalan-de tuwabume tutabuci acambi.”（佚名，1778c，頁 27b—28a；慶桂等，1807，頁 11a）（應垂示天下萬世），以“tuwabume”翻譯「示」，較滿文《源流考》貼合漢文；不過滿文《源流考》另外使用了“isitala”（直至）一詞，也頗符合語意，因為天下萬世乃是一時間延續的概念。

參、從差異看編纂過程

前文比對命輯《滿洲源流考》上諭的滿漢文本，研究發現漢文本內容高度一致，僅存在個別文字的差異，且其中大部分僅是異體字之別。臺北故宮的長本上諭檔與方本上諭檔，以及第一歷史檔案館的上諭檔，彼此之間沿襲關係如何，是可以追究的問題（莊吉發，1978），而上諭傳抄盛京等地方行政單位的過程，也是可以再追問的問題。

相較於漢文本文字的高度相同，滿文本的內容卻不盡相同，滿文《源流考》與滿文《起居注冊》的語句順序及用字均不一致，滿文《實錄》版雖與滿文《起居注冊》版的語句順序較為一致，但用字仍有不同；且斷句相對更貼合漢文《實錄》。顯示當時滿文《實錄》纂修時，並不完全照錄滿文《起居注冊》，同時並未參考已經成書的滿文《源流考》。

究之三種滿文本上諭的時空背景，滿文《源流考》應是較能反應編纂者思想的譯本，滿文《起居注冊》則是最接近上諭發布時間的版本，滿文《實錄》則反映了嘉慶朝官員對此篇上諭的理解。相較而言，有時是滿文《源流考》較貼合漢文，但有時則相反，不過滿文《源流考》的譯文雖未完全貼合漢文，但其語意卻與漢文頗為契合；滿文《起居注冊》雖較為貼合上諭字句，但卻有誤解上意的情況；滿文《實錄》的語句順序看得出承襲自滿文《起居注冊》

譯文，但由於滿文《起居注冊》本身追求字面上與漢文貼合，因此滿文《實錄》在此基礎上亦有理解錯誤的情況，而從滿文《實錄》對滿文《起居注冊》的修改看來，可看出滿文《實錄》本身也是追求貼合漢文本的文字。

漢文本高度相同，滿文本卻差異甚大，除了代表漢文應是第一稿之外，值得追問的是，為什麼對於第二稿的譯本，反而會有修改的過程？滿文《起居注冊》與滿文《實錄》看起來有沿襲的關係，同時滿文《實錄》也有不少對滿文《起居注冊》的修改之處，除部分原屬於滿文《起居注冊》的錯誤之外，許多修改其實只是換句話說，並不涉及譯文正確與否，為何各版的漢文本幾乎是一字不漏地照騰，滿文卻不這麼做呢？若說因為滿文是第二稿，所以不需像漢文這麼嚴格地一致，但對於編纂人員而言，照錄不是比較容易嗎？本文認為原因或許在滿文《起居注冊》的修纂過於倉促之故。

《起居注冊》制度原先的設計是在彙整之後「每葉鈐以翰林院印，貯之鐵甌，扃鑰封識，歲終題明送內閣，會同內閣學士監視藏之內閣大庫」（清高宗，1983，頁28），亦即《起居注冊》的修纂時間本來就有限。隨著清政府檔案制度日趨完備，《起居注冊》所記注之內容與其他檔案必有重複，因此時間愈後，《起居注冊》的纂修愈依賴其他部院檔冊。乾隆朝之《起居注冊》，通常是隔年修纂上一年的《起居注冊》，並於12月封存（托津，1991；莊吉發，1980）。每年的《起居注冊》於隔年年末修成，這樣的成例一直持續到清末（陸潤庠、榮慶，1910）。檔案中可見起居注官於一年之開始要求各單位彙編去年之檔案（佚名，1781，1844），有些部院甚至遲交檔案，起居注官亦會向各部院詢問去年的相關細節，¹²從檔案時間可見《起居注冊》可能過了大半年都還在修纂。

莊吉發（1980）本於實物文獻的研究，指出《起居注冊》是先修漢文本再修滿文本，並舉乾隆三十六年《起居注冊》為例，該年正月下的《起居

¹² 可見相關檔案（佚名，1800），此時已十一月，但起居注冊仍未完成。另查成書之《起居注冊》，可知該親王為儀親王永璇。

注冊》稿本封面寫有「九月二十六日送繙，十月十四日領回」，三月上稿本則寫「九月二十六日送繙，十月十四日收回」（頁 131—132）。¹³ 由此可知，翻譯的工作約莫僅有 20 個工作日，而且上半年的《起居注冊》直到九月才完成草本，要到十月中旬才完成滿文本，可見留給滿文本的翻譯時間並不多，滿文本可能有趕工的狀況，因此錯誤也較多。

收有命輯《滿洲源流考》上諭的《起居注冊》草本，並未寫明送翻與領回時間。該段《起居注冊》草本於命輯《滿洲源流考》上諭之後注明「前經降旨一道，增」（佚名，1778b，十九日壬子，段 4），而在《起居注冊》正本確實較《起居注冊》草本多一段上諭，滿文《起居注冊》也較《起居注冊》草本多出該道上諭，推測此時或為簡化行政程式，是完成正本之後才送翻。無論如何，《起居注冊》滿文本的翻譯工時都不長。前引《嘉慶朝上諭檔》提及《滿洲源流考》滿文本直到嘉慶四年才成書，若《起居注冊》的修纂如此倉促，必須在上諭發布的隔年便完成，那麼滿文本《起居注冊》就沒有參考滿文本《源流考》的條件。

這應是比較三份滿文本時，會發現滿文《起居注冊》的翻譯有些地方確實較不高明，甚至有誤解的原因。滿文《實錄》與滿文《起居注冊》滿文本不同的原因，應是實錄館臣知道滿文《起居注冊》中的文字並非原創，而翻譯過程較趕，錯誤可能較多，或是有格式、用語不劃一之處，因此必須加以修改。乾隆四十二年份的《實錄》大約在嘉慶十年（1805 年）完成，¹⁴ 時間上有條件參考《滿洲源流考》滿文本。但《實錄》可能僅依據《起居注冊》修改，且此時距離原始的上諭發布時間更遠，因此可能出現脫離過往語境而無法正確理解之處。

¹³ 筆者亦親見三月上稿本，情況如莊吉發先生所述（佚名，1772）。

¹⁴ 《清實錄》記載嘉慶十年皇帝恭閱其皇考之實錄時，皇帝引用了乾隆四十一年二月份的諭旨，由此推斷乾隆四十二年份的《實錄》也在這段時間內修纂完成；另外，嘉慶七年也提及《高宗純皇帝實錄》「進呈至二十年」。見《清實錄》（曹振鏞等，1986，頁 139、430）。

肆、結語

本文比對乾隆四十二年命輯《滿洲源流考》上諭的滿漢文本，發現漢文本即便有許多版本，內容卻高度相似。相較於漢文本的高度相同，滿文本卻有許多差異，滿文《源流考》與滿文《起居注冊》語句順序、理解邏輯與用字均不一致，滿文《實錄》雖與滿文《起居注冊》語句順序較為一致，但用字仍有不同，且斷句相對上更貼合漢文《實錄》。此現象顯示滿文《實錄》在纂修時，應是以滿文《起居注冊》為底稿但並不完全照錄，同時未參考已經成書的滿文《源流考》。原因應在於滿文《起居注冊》修纂倉促，滿文《實錄》遂在其基礎上修改，但亦有趕辦之問題，滿文本《實錄》可能又需待漢文本《實錄》完成方開始纂修（楊立紅、朱正業，2014），因此也未有時間逐一核對曾經出版的如滿文本《源流考》等材料，更何況不是所有上諭都有滿文譯本，與其費心找到一本書又只能翻譯幾道上諭，滿文《實錄》翻譯人員不如拿已經成文且連貫的滿文《起居注冊》為底稿。對於翻譯人員而言，滿文因是第二稿，只要追求意思符合漢文即可，而不需追求字字照錄。這同時也顯示在清朝滿文文書制度中，有時文義較文字的傳真來得重要，而這樣的行政程序保留了翻譯者對於文本的理解。

無論如何，在此例中滿文文獻雖是二手材料，卻可以看出滿文本保留了翻譯者對同一漢文材料的不同理解。如前所述的究竟是「金世祖」還是「金始祖」；是「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還是「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對於「建州」應該怎麼理解等問題，都顯示滿文材料是我們理解漢文材料的內容與傳播時，不可或缺的一個側面。本文將此同一材料的滿文各版本修改幅度明顯高於漢文各版本的現象，稱為「同調異聲」，亦即在同一主旋律下的不同聲音，此間的差異或許不到歐立德（2006）所言滿漢檔案「二重唱」的程度（頁10），所代表的也並非更接近統治者內心想法的聲音，但可能代表了基層官僚的理解與想法，亦不可忽視。本文希望藉由命輯《滿洲源流考》上諭的例

子，拋磚引玉，令吾人對此種滿文材料的性質能有更深之理解與運用，避免過度誇大或貶低了其重要性。

沈衛榮（2019）提及近年來對於滿漢文檔案的性質，出現一種過猶不及的態度，對漢文文本的真實性表達懷疑，認為滿文等其他語言的檔案可以更接近真實，對非漢文檔案的真實性則不表懷疑，但不管是哪個語言的檔案，都是經官方程序所形成，會盡量保持各語種內容的一致，製作者不會刻意竄改某一個語種的檔案。在各語種間讀到的差異，很可能在當時語文和歷史語境中是完全相同的意思，雖然這些文字的不同只是表面的，但其中的「細微差別」正是學者值得著力之處，將他們簡單看成漢人竄改是不正確和不學術的態度（頁 257—261）。這樣的研究取徑能夠加深對於各語種的語境與相關制度的認識，誠如本文所呈現的，文本呈現的諸多差異，並非是某文本竄改了內容，而是不同譯者對同一事情的理解差異。本文的例子特別可見基層文官對於皇帝上諭的理解並非完全一致，讓我們見到相異的思想與詮釋，有時候可能正是這些不同於第一手史料的理解，推動了歷史的發展。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1）。《乾隆朝上諭檔》（第8冊）。檔案。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Ed.). (1991). *Qianlong chao shangyu dang* (Vol. 8). Dang An.】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2000）。《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4冊）。廣西師範大學。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Ed.). (2000). *Jiaqing Daoguang liang chao shangyu dang* (Vol. 4). Guangxi Shifan Daxue.】

托津（1991）。《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內閣·記注事宜》（第792卷）。文海。

【To, J. (1991). *Da Qing huidian shili (Jiaqing chao). Neige. Jizhu shiyi* (Vol. 792). Wenhai.】

佚名（1690）。《滿漢同文全書》（第八卷）（編號：滿41.5512/2）。中央民族大學，北京。

【Anonymous. (1690). *Man Han tongwen quan shu* (Vol. 8) (File number: Man41.5512/2).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佚名（1772）。《起居注冊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上》（編號：104000984）。國立故宮博物院，臺北。

【Anonymous. (1772). *Qiju zhuce Qianlong sanshiliunian sanyue shang* (File number: 104000984).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佚名（1777a）。《奉上諭頃閱金史世紀我朝肇興舊稱滿珠相沿訛為滿洲他如沿革滿洲始基古今地名同異稽考勒為一書著大學士阿桂等悉心檢核分條編輯以次呈覽由》（編號：12264）。遼寧省檔案館，瀋陽。

【Anonymous. (1777a). *Feng shangyu qingyue Jinshishiji wo chao zhaoxing jiucheng manzhu xiangyan e wei Manzhou ta ru yange Manzhou shi ji gujin*

diming tong yi jikao leiwei yi shu zho daxueshi Agui deng xixin jianhe fen tiao bianji yi ci cheng lan you (File number: 12264). Liaoning Provincial Archives, Shenyang.】

佚名 (1777b)。《為本朝肇興東土仍係大金部族事》(檔號: 118046001)。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 臺北。

【Anonymous. (1777b). *Wei benchao zhaoxing dongtu reng xi da Jin buzu shi* (File number: 118046001). Fu Ssu-nien Librar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佚名 (1777c)。《乾隆四十二年長本上諭檔》(編號: 601000045)。國立故宮博物院, 臺北。

【Anonymous. (1777c). *Qianlong sishiernian changben shangyu dang* (File number: 601000045).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佚名 (1778a)。《起居注冊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下正本》(編號: 104001233)。國立故宮博物院, 臺北。

【Anonymous. (1778a). *Qiju zhuce Qianlong sishier nian ba yue xia zhengben* (File number: 104001233).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佚名 (1778b)。《起居注冊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下草本》(編號: 104001257)。國立故宮博物院, 臺北。

【Anonymous. (1778b). *Qiju zhuce Qianlong sishier nian ba yue xia caoben* (File number: 104001257).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佚名 (1778c)。《滿文起居注冊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下》(編號: 114001310)。國立故宮博物院, 臺北。

【Anonymous. (1778c). *Manwen qiju zhuce Qianlong sishier nian ba yue xia* (File number: 114001310).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佚名 (1781)。《為恭纂乾隆四十五年起居注冊將乾隆四十五年份所有欽奉清漢字上諭等按月造冊送館事致內務府》(編號: 05-13-002-000453-001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北京。

【Anonymous. (1781). *Wei gong zuan Qianlong sishiwunian qiju zhuce jiang*

Qianlong sishiwu nianfen suoyou qinfeng Qing Han zi shangyu deng anyue zaoce song guan shi zhi neiwufu (File number: 05-13-002-000453-0016).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Beijing.】

佚名（1800）。《為恭纂嘉慶四年份記注移查正月二十六日二月初一日遣王行繹祭禮是何王大臣銜名事致內務府》（編號：05-13-002-000082-013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

【Anonymous. (1800). *Wei gongzuan Jiaqing si nianfen jizhu yicha zhengyue ershiliu ri eryue chu yi ri qian wang xing yi jili shi he wang dachen xianming shi zhi neiwufu* (File number: 05-13-002-000453-0016).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Beijing.】

佚名（1844）。《為恭纂道光二十三年份記注片催將補授官員引見各檔案抄錄事由開明月日每月各一本造冊送來事致內務府》（編號：05-13-002-000685-013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

【Anonymous. (1844). *Wei gongzuan Daoguang ershisan nianfen jizhupian cui jiang bu shou guanyuan yinjian ge dangan chaolu shiyou kaiming yueri meiyue ge yiben zaoce song lai shi zhi neiwufu* (File number: 05-13-002-000453-0016).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Beijing.】

佚名（1863—1907）。《翻譯批答》（編號：滿 41.5519/1）。中央民族大學，北京。

【Anonymous. (1863-1907). *Fanyi pi da* (File number: Man41.5519/1).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李蔭樾（1735）。《福建建寧總兵官為恭懇聖懷寬慰事》（編號：011621）。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臺北。

【Li, Y. Y. (1735). *Fujian Jianning zongbingguan wei gongken shenghuai kuanwei shi* (File number: 011621). Fu Ssu-nien Librar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沈啟亮（2008）。《大清全書》。遼寧省民族。

【Sheng, Q. L. (2008). *Da Qing chuanshu*. Liyaoning Mingzu.】

沈衛榮（2019）。《大元史與新清史》。上海古籍。

【Sheng, W. R. (2019). *Da Yuanshi yu xin Qingshi*. Shanghai Guji.】

阿桂、于敏中（1967）。《欽定滿洲源流考》。文海。

【A, G., & Yu, M. Z. (1967). *Qinding Manzhou yuanliu kao*. Wenhai.】

阿桂、于敏中、和珅、董誥（1799）。《滿文本欽定滿洲源流考》（編號：122 K282.1 0547）。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

【A, G., Yu, M. Z., He, S., & Dong, G. (1799). *Manwenben qinding Manzhou yuanliu kao* (File number: 122 K282.1 0547).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Beijing.】

阿爾泰語研究所（1978）。《御製清文鑑（上）》。曉星女子大學。

【Institute of the Altaic Studies. (1978). *Dictionary of Manchurian (Vol. I)*. Hyosung Women's University.】

洪麗珠（2018）。〈義隨世變——元人的「勝國」運用〉。《文史》，2，151—168。

【Hung, L. C. (2018). Meaning changes according to the times: The understanding of word shengguo by Yuan historians. *Wenshi*, 2, 151-168.】

孫文良（1987）。〈《滿洲源流考》辨析〉。《社會科學輯刊》，50，47—55。

【Sun, W. L. (1987). *Manzhou Yuanliukao bianxi*.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0, 47-55.】

曹振鏞、戴均元、英和、汪廷珍（1986）。《清仁宗實錄》。中華書局。

【Cao, Z. Y., Dai J. Y., Ying, H., & Wang, T. Z. (1986). *Qing Renzong shilu*. Zhonghua Shuju.】

清高宗（1772）。《欽定清漢對音字式》（編號：429.1 4123），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臺北。

【Qing Gaozong. (1772). *Qinding Qing Han duiyin zishi* (File number: 429.1 4123). Fu Ssu-nien Librar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清高宗（1983）。《大清會典則例·起居注館》（第173卷）。臺灣商務印書館。

【Qing Gaozong. (1983). *Da Qing huidian ze li. Qiju zhuguan (Vol. 173)*.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清高宗（1986）。《御製增訂清文鑑》（第3卷）。世界書局。

【Qing Gaozong. (1986). *Yuzhi zengding Qingwen jian (Vol. 3)*. Shijie Shuju.】

莊吉發（1978）。〈清代上諭檔的史料價值〉。載於莊吉發（主編），《清代史料論述（一）》（頁155—210）。文史哲。

【Chuang, C. F. (1978). *Qingdai shangyudang de shiliao jiazhi*. In C. F. Chuang (Ed.), *Qingdai shiliao lunshu, 1* (pp. 155-210). Wenshizhe.】

莊吉發（1980）。〈清代起居注冊的編纂及其史料價值〉。載於莊吉發（主編），《清代史料論述（二）》（頁117—150）。文史哲。

【Chuang, C. F. (1980). *Qingdai qiju zhuce de bianzuan ji qi shiliao jiazhi*. In C. F. Chuang (Ed.), *Qingdai shiliao lunshu, 2* (pp. 117-150). Wenshizhe.】

莊吉發（2013）。〈文獻足徵：以康熙朝滿文本〈起居注冊〉為中心的比較研究〉。《滿語研究》，1，5—21。

【Chuang, C. F. (2013). Comparative study among Manchu “Accommodation Registration” in emperor Kangxi period. *Manchu Studies, 1*, 5-21.】

陳捷先（1978）。〈清太宗及其後各朝滿文實錄之修繕〉。載於陳捷先（主編），《滿文清實錄研究》（頁101—114）。大化。

【Chen, C. H. (1978). *Qingtaizong ji qihou ge chao Manwen shilu zhi xiushan*. In C. H. Chen (Ed.), *Manwen Qing shilu yanjiu* (pp. 101-114). Dahua.】

陳捷先（1983）。〈景印清代起居注冊前言〉。載於陳捷先（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咸豐朝》（第1冊）（頁1—8）。聯經。

【Chen, C. H. (1983). *Jingyin Qingdai qiju zhuce qianyan*. In C. H. Chen (Ed.), *Qingdai qiju zhuce—Xianfeng chao (Vol. 1)* (pp. 1-8). Lianjing.】

陳捷先（2007）。《明清史》。三民。

【Chen, C. H. (2007). *Ming Qing shi*. Sanmin.】

陳捷先（2018）。〈清代滿文起居注介紹〉（陳晨譯）。載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主編），《清史研究集》（第9輯）（頁258—273）。中國大百科全書。（原著出版年：1973）

【Chen, C. H. (2018). Qingdai Manwen qijuzhu jieshao (C. Chen, Trans.). In 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Ed.), *Qingshi yanjiu ji (Vol. 9)* (pp. 258-273). Zhongguo Da Baikequanshu.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3)】

陸潤庠、榮慶（1910）。《奏為宣統元年起居注成書事》（編號：04-01-38-0030-02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

【Lu, R. X., & Rong, Q. (1910). *Zou wei Xuantong yuannian qiju zhu chengshu shi* (File number: 04-01-38-0030-024).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Beijing.】

傅斯年（2012）。《東北史綱》。上海古籍。

【Fu, S. N. (2012). *Dongbei shigang*. Shanghai Guji.】

馮明珠（2006）。《滿文原檔》（第1冊）。沈香亭。

【Feng, M. C. (2006). *Manwen yuandang (Vol. 1)*. Shenxiangting.】

馮爾康（2006）。《清史史料學》。瀋陽。

【Feng, E. K. (2006). *Qingshi shiliao xue*. Shenyang.】

楊立紅、朱正業（2014）。〈《清實錄》纂修程式述論〉。《歷史檔案》，2，125—130。

【Yang, L. H., & Zhu, Z. Y. (2014). *Qingshilu zuanxiu chengshi shulun. Historical Archives*, 2, 125-130.】

賈楨、寶鋆、文祥（1970）。《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文海。

【Jia, Z., Bao, J., & Wen, X. (1970). *Chouban yiwu shimo (Xianfeng chao)*. Wenhai.】

趙令志、郭美蘭（2015）。《準噶爾使臣檔之比較研究》。中央民族大學。

【Zhao, L. Z., & Guo, M. L. (2015). *Zhungaer shichen dang zhi bijiao yanjiu*.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慶桂、董誥、德瑛、曹振鏞（1807）。《滿文本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第1039卷）（編號：113000557）。國立故宮博物院，臺北。

【Qing, G., Dong, G., De, Y., & Cao, Z. Y. (1807). *Man wenben da Qing Gaozong chun huangdi shilu (Vol. 1039)* (File number: 113000557).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慶桂、董誥、德瑛、曹振鏞（1986）。《清高宗實錄》（第1039卷）。中華書局。

【Qing, G., Dong, G., De, Y., & Cao, Z. Y. (1986). *Qing Gaozong shilu (Vol. 1039)*. Zhonghua Shuju.】

歐立德（2006）。〈滿文檔案與新清史〉。《故宮學術季刊》，24（2），1—18。

【Elliott, M. C. (2006). *Manwen dangan yu xin Qingshi*.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24(2), 1-18.】

鄭天挺（2011）。《清史探微》。北京大學。

【Zheng, T. T. (2011). *Qingshi tanwei*. Peking University.】

日文文獻

河內良弘、清瀨義三郎則府（2002）。《滿洲語文語入門》。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

【Kawachi, Y., & Kiyose, G. N. (2002). *Manshūgo bungo nyūmon*. Kyōto Daigaku Gakujutsu Shuppankai.】

附錄

表一之一

本文比對內容

上諭檔	滿文《源流考》	滿文《起居注冊》	滿文《實錄》
頃閱金史世紀云：金世祖 ¹⁵ 居完顏部（佚名，1777c，頁83b）	jakan aisin gurun-i suduri-i jalan-i hergin-be tuwaci. tede arahangge aisin gurun-i deribuhe mafa wanggiyan aiman-de tembi.（阿桂等，1799，頁1a）	jakan aisin gurun-i suduri-i jalan-i hergin-i bithe-be tuwaci. tede aisin gurun daci wanggiya aiman-de tehebi.（佚名，1778c，頁20a）	jakan aisin gurun-i suduri jalan-i hergin-i bithe-be tuwaci. tede aisin gurun-i ši dzu han. daci wanggiya aiman-de tehebi.（慶桂等，1807，頁6a）
史又稱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肅慎地。我朝肇興時，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後改滿珠。 ¹⁶ 而漢字相沿，訛為滿洲，其實即古肅慎為珠申之轉音，更足徵疆域之相同矣。（佚名，1777c，頁83b—84a）	suduri-de geli aisin gurun-i mafa mo ho aiman-ci tucikebi. julgei su šen gurun-i ba inu sehebi. musei gurun deribume mukdehe fonde daci manju-i harangga niyalma-be jušen sembihe. amala manju seme halaha bicibe. nikan hergen hergen-i songkolome arahai tašarame man jeo sehe yargiyan oci uthai julgei su šen sere hergen-be jušen sehe forgošoho mudan. ede jase jecen-i ishunde adališara-be ele yargiyalaci ombikai.（阿桂等，1799，頁1b—2a）	suduri bithe-de. geli aisin gurun-i nenehe jalan. mo he aiman-ci tucikengge. julgei su šen-i ba inu sehebi. musei gurun fukjin mukdere-de. daci manju-i hartungga-be jušen sembi. amala manju seme halaha bicibe. nikan hergen ishunde songkolohoi tašarame. man jeo seme arahabi. terei yargiyan-be kimcici. julgei su šen serengge. uthai jušen sere forgošoho mudan. ede jase jecen ishunde adališara-be ele temgetuleci ombi.（佚名，1778c，頁20b—21a）	suduri bithe-de. geli aisin gurun-i nenehe jalan. me he aiman-ci tucikengge julgei su šen-i ba inu sehebi. musei gurun fukjin mukdere-de. daci manju seme halaha bicibe. nikan g i s u n i s h u n d e songkolohoi tašarame man jeo seme arahabi. terei yargiyan-be kimcici. julgei su šen serengge. uthai jušen sehei forgošoho mudan. ede jase jecen ishunde adališara-be ele temgetuleci ombi.（慶桂等，1807，頁6b）

(續下頁)

¹⁵ 《滿洲源流考》為「金始祖」。

¹⁶ 《實錄》，一檔館藏《上諭檔》、《內閣大庫檔案》、《盛京內務府檔案》均寫為「後改稱滿珠」。

表一之一

本文比對內容(續)

又後漢書三韓傳，為 ¹⁷ 辰韓人兒生欲令頭匾 ¹⁸ ，押之以石。(佚名，1777c，頁84a)	geli amagangga ha.n gurun-i bithe-i ilan ha.n gurun-i ulabun-de cen ha.n gurun-i niyalma. juse banjifi uju-be halfiyan okini seme wehe-i gidambi sehebi. (阿桂等，1799，頁2a-b)	geli amgangga ha.n gurun-i bithei san ha.n sere ulabun-de. cen ha.n seme narahabi[arahabi]. tubai niyalma jui banjifi uju-be halfiyan obuki seme wehei gidambi sehebi. (佚名，1778c，頁21a)	geli amgan ha.n gurun-i bithei ilan ha.n sere ulabun-de. cen ha.n-i niyalma. jui banjifi uju-be halfiyan obuki seme wehei gidambi sehebi. (慶桂等，1807，頁6b)
意當時三國必有三汗 ¹⁹ ，各統其一。史家不知汗為君長之稱，遂以音同誤譯。(佚名，1777c，頁84a)	gūnici tere fon-i ilan gurun-de. urunakū ilan han bifi meimeni emte gurun-be kadalajahi dere. suduri arara urse. han sere hergen ejen da-i tukiye hengge-be sarkū ofi. uthai mudan adališaha hergen-be tašarame nikanrame ubaliyambikai. (阿桂等，1799，頁3a-b)	ainci tere fon-i ilan gurun-de. urunakū ilan han bifi. meimeni emu babe uherilehebi. suduri arara urse han serengge. ejen-i tukiyen inu-be sarkū ofi. uthai mudan gaime tašarame ubaliyambuhabi. (佚名，1778c，頁22a)	ainci tere fon-i ilan gurun-de. urunak ilan ha.n bifi. meimeni emu babe uherilembehe. suduri arara urse ha.n serengge. ejen seme tukiyerengge inu-be sarkū ofi. uthai mudan-de acabume tašarame ubaliyambuhabi. (慶桂等，1807，頁7a-b)
致明季狂誕之徒，尋摘字句，肆為詆毀，此如桀犬之吠，無 ²⁰ 庸深較。(佚名，1777c，頁84b)	ming gurun-i dubesilehe fon-i balama kūwasa urse gisun hergen-be sonjome gaifi gūnin-i c i h a i e h e c u m e wakašara-de isinahabi. ere uthai giyei han-i indahūn gūwara adali. šumilame bodoro-be baiburakū. (阿桂等，1799，頁4a-b)	ming gurun-i fonde. balame holo urse. gisun hergen-be sonjome gaifi. gūnin cihai ehecume gisurerengge ere uthai giyei han-i indahūn gūwara adali šumilame faksalara-be baiburakū. (佚名，1778c，頁22b-23a)	ming gurun-i fonde. balama holo urse. gisun hergen-be sonjome gaifi. gūnin-i cihai ehecume wakašahangge. ere uthai giyei ha.n-i indahūn gūwara adali šumilame faksalara-be baiburakū bicibe (慶桂等，1807，頁7b-8a)

(續下頁)

¹⁷ 《實錄》，一檔館藏《上諭檔》、《內閣大庫檔案》、《盛京內務府檔案》均寫為「謂」。

¹⁸ 《實錄》寫為「扁」。

¹⁹ 《內閣大庫檔案》、《盛京內務府檔案》「汗」為「漢」，臺北故宮藏《起居注冊》草本則原寫漢，後改為汗。

²⁰ 《實錄》為「毋」。

表一之一

本文比對內容 (續)

<p>至於尊崇本朝者。謂雖與大金俱在東方，而非其同部，則所見殊小。我朝得姓、羅氏。國語謂金曰愛辛。可為金源同派之證。蓋我朝在大金時。未嘗非完顏氏之服屬。猶之完顏氏在今日。皆為我朝之臣僕。普天率土。統於一尊。理固如斯也。譬之漢唐宋明之相代，豈皆非其勝朝之臣僕乎。(佚名，1777c，頁 84b)</p>	<p>jai musei gurun-be wesihuleme tukiyere urse. udu amba aisin gurun-i sasa gemu dergi ergi-de bicibe harangga aiman waka sehebi sahangge mujak buya musei gurun-i hala aisin gioro sehe. manju gisun gin-be aisin sembi. erebe aisin gurun-i emu sekiyen ojoro temgetu obuci ombi. ainci musei gurun amba aisin gurun-i fonde wanggiyan hala-i harangga waka seci ojarah uthai wanggiyan hala ne gemu musei gurun-i amban aha ojoro adali. abkai fejergi gubci baingge emu ejen-de uherilebure-be dahame. giyan-de yargiyan-i uttu. duibuleci ha.n gurun tang gurun sung gurun ming g u r u n - i i s h u n d e halanjahangge. aika gemu etehe gurun-i amban aha wakao. (阿桂等，1799，頁 4b—5b)</p>	<p>jai musei gurun-be wesihuleme tukiyere urse. muse-be udu aisin gurun-i sasa gemu dergi bade bicibe. emu aiman-i niyalma waka seme henduhengge. ere sahangge jaci ajigen. musei gurun-i hala. aisin gioro hala sembi. manju gisun-de gin-be aisin sembi. erebe aisin gurun-de daci emu fisen ojoro temgetu obuci ombi. musei gurun. aisin gurun-de bisire fonde. wanggiya halangga niyalmai hartungga waka seci ojarah. uthai te-i forgon-de wanggiya halangga niyalma gemu musei gurun-i amban aha oho adali abkai fejergi gubci baingge uhei emu-be wesihulerengge giyan uttu kai. te bicibe ha.n gurun. tang gurun sung gurun. ming gurun-i ishunde ulanduhangge. aika gemu nenehe jalan-i amban aha waka semeo. (佚名，1778c，頁 23a—24a)</p>	<p>jai musei gurun-i wesihuleme tukiyere urse. muse-be udu aisin gurun-i sasa gemu dergi bade bicibe. emu aiman-i niyalma waka seme henduhengge. ere sahangge jaci ajigen. musei gurun-i hala. aisin gioro sembi. manju gisun-de gin-be aisin sembi. erebe daci aisin gurun-i emu fisen ojoro temgetu obuci ombi. muse gurun. aisin gurun-de bihe fonde. wanggiya halai hartungga waka seci ojarahū. uthai te-i forgon-de wanggiya halai niyalma gemu musei gurun-i amban aha oho adali. abkai fejergi gubci baingge uhei emu-be wesihulehengge giyan uttu kai. te bicibe. ha.n gurun. tang gurun. sung gurun. ming gurun-i ishunde ulanduhangge. aika gemu nenehe jalan-i amban aha waka semeo. (慶桂等，1807，頁 8a-b)</p>
<p>且彼妄信讒言，潛謀戕害，於是我太祖赫然振怒，以七大恨告天，興師報復。(佚名，1777c，頁 85a)</p>	<p>tese geli acuhiyan gisun-de balai akdafi dorgideri hebešeme ebdereme jocabure jakade. tereci musei taidzu han ambarame jili banjifi. nadan amba koro baita-be abka-de alafi cooha gaifi kimun gaime. (阿桂等，1799，頁 6b)</p>	<p>ere dade ce geli acuhiyadara gisun-be balai donjifi. jendu argai nungneme jobobure jakade. taidzu han ambula jilidafi. nadan amba seyecun-be arafi. abka-de alame wecefi. kimun gaime cooha deribufi. (佚名，1778c，頁 25a)</p>	<p>ere dade ming gurun geli acuhiyadara gisun-be balai donjifi. jendu argai nungneme jobobure jakade. taidzu han ambarame jili banjifi. nadan nadan amba koro-be abka-de alame wecefi. kimun gaime cooha deribufi. (慶桂等，1807，頁 9a)</p>

(續下頁)

表一之一

本文比對內容 (續)

<p>且漢高乃秦之亭長，唐祖乃隋之列公，宋為周之近臣，明為元之百姓，或攘或侵，不復顧惜名義。若我朝乃明與國，當闔賊擾亂，明社既移之後，吳三桂迎迓王師入關，為之報仇²¹殺賊(佚名，1777c，頁 85a)</p>	<p>tere anggala ha.n gurun-i g'ao dzu han serengge. cin gurun-i gašan-i da. tang gurun-i g'ao dzu han serengge. sui gurun-i siraha gung. sung gurun seci. jeo gurun-i hanci amban. ming gurun seci. yuwan gurun-i tanggū halai irgen. uttu bime. ememungge durime gaihabi. ememungge necinjime sucunjihabi. gebu jurgan-be majige hono hairame tuwašataha ba akū. aika musei gurun oci. ming gurun-i gese sasa gurun. cuwangdzei hūlha burgindume facuhūraha. ming gurun-i doro emgeri guribuhe manggi. u san gui han-i cooha-be okdome gajifi. furdan-de dosifi tesei jalin hūlha wame kimun gaiha. (阿桂等，1799，頁 7a-b)</p>	<p>tere anggala han gurun-i g'aodzu han oci. cin gurun-i gašan-i da. tang gurun-i g'aodzu han oci. sui gurun-i liyei gung. sung gurun oci. jeo gurun-i hanciki amban. ming gurun oci. yuwan gurun-i tanggū hala bihe. embici durire embici necinere-de fuhali gebu jurgan-be gūninahakūbi. musei gurun oci. ming gurun-i adaki gurun. cuwang dzei hūlha ming gurun-be facuhūrame jobobume guribuhe amala. u san gui. wang-ni cooha-be furdan-de okdome dosimbufi. ceni jalin kimun gaime hūlha-be waha manggi. (佚名，1778c，頁 25b—26a)</p>	<p>tere anggala. han gurun-i g'ao dzu han oci. cin gurun-i gašan-i da. tang gurun-i g'ao dzu han oci. sui gurun-i liye gung. sung gurun oci. jeo gurun-i hanciki amban. ming gurun oci. yuwan gurun-i irgen bihe. embici durime gaiha embici gidana fi gaihangge. fuhali gebu jurgan-be gūninahakūbi musei gurun oci. ming gurun-i adaki gurun. liodzei hūlha facuhūrame jobobume ming gurun-i doro-be guribuhe amala. u san gui. amba cooha-be okdome furdan-de dosifi. ceni jalin kimun gaime hūlha-be waha manggi. (慶桂等，1807，頁 9b)</p>
<p>至若我國家誕膺天眷，朱果發祥，亦如商之元鳥降生，周之高禘履武(佚名，1777c，頁 85b)</p>	<p>jai musei gurun abkai kesi-be alifi. fulgiyan tubihe-i sabi-de eldekengge. inu šang gurun-i yacin gasha-i turgun-de banjiha. jeo gurun-i amba niyalmai songko-be fehuhe adali. (阿桂等，1799，頁 8a-b)</p>	<p>jai musei gurun abkai kesi-be alifi. fulgiyan tubihe-i sabi tucinjihengge inu uthai šang gurun-i yacin gasha wasifi banjire. jeo gurun-i g'ao mei wecen-de bethei songko-be fehure baitai adali. (佚名，1778c，頁 26a-b)</p>	<p>jai musei gurun abkai kesi-be alifi. fulgiyan tubihe-ci hūturi badarakangge inu šang gurun-i yacin gasha wasifi banjire. jeo gurun-i g'ao mei wecen-de bethei songko-be fehure baitai adali. (慶桂等，1807，頁 10a)</p>

(續下頁)

²¹ 《實錄》為「讎」。

表一之一

本文比對內容 (續)

<p>是金之先即有字矣，而本朝國書，則自太祖時命額爾德尼巴克什等遵製通行。或金初之字，其後因式微散佚，遂爾失傳 (佚名，1777c，頁 85b)</p>	<p>uttu oci aisin gurun-i onggolo uthai hergen bihe kai. muse gurun-i hergen oci taidzu han-i forgon-de erdeni baksi sede afabufi songkolome banjibufi bireme yabubuhabi. ainci aisin gurun-i tuktan fon-i banjibuha hergen amala ebereme wasifi samsime waliyabure jakade (阿桂等，1799，頁 9a-b)</p>	<p>erebe tuwaci aisin gurun-i cargi-de uthai hergen bisire-be saci ombi. musei gurun-i manju hergen-be taidzu han-i fonde. baksi erdeni sede afabufi. tokto bufi bireme yabubuhabi. ainci aisin gurun-i fukjin tokto buha hergen. amala eberefi tereci ulara-be ufarafi (佚名，1778c，頁 27a-b)</p>	<p>erebe tuwaci aisin gurun-i onggolo uthai hergen bisire-be saci ombi. musei gurun-i manju hergen oci taidzu han-i fonde. baksi erdeni sede afabufi. fukjin tokto bufi bireme yabubuhabi. ainci aisin gurun-i fukjin tokto buha hergen. amala eberefi tereci ulara-be ufarafi. (慶桂等，1807，頁 10b)</p>
<p>他如建州之沿革，滿洲之始基，與夫古今地名同異，並當詳加稽考，勒為一書，垂示天下萬世。(佚名，1777c，頁 85b)</p>	<p>jai giyan jeo-i halaha songkoloho. manjusai da sekiyen julge te-i ba na-i gebui adali encu babe gemu giyan-i narhūšame yargiyalame kimcifi emu yohi bithe obume tokto bufi. abkai fejergi tumen jalan-de isitala tutabuci acambi. (阿桂等，1799，頁 9b)</p>	<p>tereci gūwa ilibuha jeo-i dahara halara. manju-i da sekiyen. julge te-i ba-i gebu-i adali encu-be suwaliyame gemu narhūšame kimcime baicafi. šošome emu bithe arafi. abkai fejergi tumen jalan-de tuwabume tutabuci acambi. (佚名，1778c，頁 27b)</p>	<p>jai hecen ilibure-de songkoloho halaha manju-i deribuhe sekiyen. julge te-i ba-i gebu-i adali encu-be suwaliyame gemu narhūšame kimcime baicafi. šošome emu bithe arafi. abkai fejergi tumen jalan-de tuwabume tutabuci acambi. (慶桂等，1807，頁 10b—11a)</p>